

# 日本妇女在侵华战争中 具有“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立祥、韩立娟在《日本妇女与侵华战争》一文中指出:战时,部分日本妇女既饱尝了饥饿、贫困和亡夫丧子之痛,又通过“支前”等实实在在的工作盲从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些日本妇女是带着“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在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的当前形势下,如实指出这部分日本妇女盲从侵略战争之事实并剖析隐藏在这一行动背后的动力因素,对避免历史悲剧重演,重新认识日本民众与侵华战争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指出:战时日本妇女对侵略战争的盲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鼓励儿子或丈夫参军参战,为侵略战争提供充足的兵员

将儿子或丈夫送上侵略战场并“祈战死”、盼其“勿生还”的日本妇女,早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既已出现,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不仅队伍蔚为壮观,所谓“感人事迹”亦俯拾即是。一位几个儿子都死于侵略战场的普通妇女,竟对安慰自己的人说:“我不哭,是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孩子;我落泪,是因为我再也没有儿子可以送上战场了。”当年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晚年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侵华老兵东史郎,在日记中这样记述了母亲送自己出征的情景:1937年“9月1日,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

我告别。我们在旅馆的楼上见面了。母亲很冷静,重一也很冷静。接着,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啊。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没有比这时更知道母亲的伟大了。于是我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我的生母就是这样笑着和我告别的,谈话冷静,并鼓励我毅然赴死。”这是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来自生身母亲的鼓励。类似来自至亲的激励,直接强化了日军官兵为天皇的“圣战”效死疆场的极端心理,也大大加深了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战争加害。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2月中旬,大阪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准备告别新婚妻子井上千代子出征“满洲”。时年21岁的千代子为了让丈夫全身心投入侵华战争,竟在其动身的前一天夜里偷偷刎颈自杀。她在遗书中写道:“我的夫君啊,为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若问我喜从何来,这便是能够在丈夫出征前高兴地离开这个世界,这样您就没有一丝牵挂了!……请为祖国效命于战场吧!”翌日清晨,井上清一将妻子的后事托付给家人料理,自己按计划登上了开往“满洲”的军舰。井上千代子只是一名普通妇女,然其“感人事迹”经统治阶级放大宣传而在日本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喧嚣狂热之余更有好事妇女发起成立了“大阪国防妇人会”。1932年3月18日,在大阪市第五小学举行了“大阪国防妇人会”成立大会。与会者发出“巩固的国防需要后方妇女和男人并肩合作”之口号,号召全市妇女“走出厨房和家庭,奋起保卫国家”。“大阪国防妇人会”一经成立,立即引起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等军政要人的重视,酝酿将这一地方性妇女团体扩大为全国性妇女组织。同年10月24日,在东京白木屋礼堂举行了有700多名妇女参加、多位陆海军高官出席的大型集会,正式将“大阪国防妇人会”更名为“大日本国防妇人会”。自此,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置身于这一军国主义妇女团体而成为侵略战争的“协力者”。今天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战争“亡灵”有246万余尊,其中“靖国之母”和“昭和烈女”就占了7.5万余尊。

## 2. 踊跃参加后方“支前”工作,为侵略战争提供物质保障

战时日本妇女的“支前”工作,主要通过参加军国主义妇女团体有组织地进行。其“支前”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通过投身“产业报国运动”,为侵略战争提供军需物资。据统计,仅在军工企业工作的日本妇女,1944年为400万人,1945年增至600万人。

其次,通过参加各种实实在在的助战活动,为侵略战争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她们除走进工厂投身“产业报国运动”外,还走上社会参加一系列支持“国策”运动。诸如,响应政府“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积极参加“后方家庭强化运动”、“家庭节约运动”、“女性储蓄运动”、“资金募集运动”、“资源回收运动”、“军机捐献运动”、“大陆花嫁运动”、“非常时期女性训练新高潮运动”等一系列妇女“报国”运动,以缓解战争物资和资金的不足,为战争政府“分忧解难”。具体包括:“停止美容烫发”,“剪掉和服长袖”;举行提灯游行,祝贺前线“大捷”;送迎官兵出征和“凯旋”,祈愿“武运长久”;缝制“千人针”腰带,为士兵“壮行”;向前线邮寄慰问信和慰问袋,鼓励官兵“英勇杀敌”;救治伤残军人,使之获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慰藉;慰问和

救助身边军属,解除前线官兵的后顾之忧;安葬战死者遗骨和为其扫墓,让“英灵”早日安息;捐献羊毛和捐造飞机,直接提供战争物资和杀人工具;充当“满洲花嫁”(即“满洲新娘”),直接效力于殖民地统治,等等。

## 3. 积极创作助战文学作品和国策电影,为侵略战争制造舆论氛围

在政府实施“思想战”、“舆论战”、“文坛总动员”的过程中,包括女作家、女诗人、女记者、女演员、女教师等在内的部分日本知识女性,通过笔和口加入了赞美战争的大合唱。尤其由作家、诗人、记者组成的“笔部队”,发挥了“枪部队”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首先,亲赴前线考察并撰写“从军记”等战地报告,鼓舞国民和军队士气。吉屋信子是最早开赴中国战场进行战地慰问和考察的女性作家之一。1938年10月,她率先发表华北战场战地报告——《捷足先登:问题交集的满苏边境,战祸连绵的张鼓峰》,发挥了“鼓舞官兵旺盛斗志之效果”;而刊登该文的《妇女之友》杂志社社长,为此收到了多份来自前线将领的感谢电。同年底,吉屋被遴选为武汉会战“笔部队”成员随军考察,又在《妇女之友》12月号上发表了配有照片的《汉口攻略从军记》、《吉屋信子·小岛政二郎·菊池宽:三从军作家献给全体国民的热血手记》等作品。1942年,吉屋又随军前往东南亚考察,发表了《法印·泰国从军记:十二月八日的法印》等文章,成为红极一时的大众小说作家和“国策推进”最得力的人物之一。正是在吉屋信子的影响下,冈田桢子、堤千代等女性作家也纷纷加入了赞美侵略战争的大合唱。

其次,在后方炮制国策电影和战争文学,制造“举国一致”支持战争之氛围。电影方面,由原节子、高峰三枝子等演员出演的《二人世界》(1940年)、《户田家的兄妹》(1941年)、《绿色大地》(1942年)、《青春的气息》(1942年)、《夏威夷·马来海战》(1942年)、《冲向决战的天空》(1943年)、《愤怒的大海》(1943)等国策电影,收到了“电影就是炮弹”之效果,“对把出征士兵引诱到战场上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小说方面,女作家们或将侵略

战争宣传为“圣战”，以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或将日军暴行美化为“勇敢”，以激励日军的杀伐恶行，其作品完全违背了“真”、“善”、“美”文学创作原则，是赤裸裸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宣传品。诗歌方面，创作出类似“吾子承蒙我大君之召唤是何等幸福”（神村照子）、“身为女人之躯的草莽臣民之热血同样气吞水火”（远山英子）等诗句的女诗人，也不在少数。1932年，著名女诗人与谢野晶子为响应政府“振兴国民精神”之号召，她撰文歌颂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涌现出来的所谓“肉弹三勇士”的“非凡忠烈”之举，号召日本国民“必须具有三勇士一样的勇气”。该文对日本“从大正民主主义走向军国主义发挥了巨大的舆论作用”，以至被日本学者评价为“女性文学家参与战争的第一号人物。”

作者分析导致部分日本妇女盲从和协助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 1. 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心理驱动

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感召的观念意识，它比一般的政治学说更具有煽动性和迷惑力，它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及其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政府长期强化这一思想观念的结果，必然滋生“大和民族优秀论”与“其他民族劣等论”这一种族差别意识，必然产生“自我认识”与“他者认识”的严重偏差，必然派生出岛国集团劣根性和愚忠盲从心理，必然左右日本国民的心理归向和造成大和民族群体向某一特定目标突进的心性。换言之，只要是天皇的意愿或冠以天皇的名义，日本人就会视为“神”的召唤，举国一致予以响应。这是导致包括妇女在内的部分日本国民盲从和协助所谓“圣战”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学者若槻泰雄曾就此深刻指出：在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国民都处于一种集体精神错乱的状态，投入到了缺乏自知之明的侵略战争中，……我对日本国民的非理性和非良心性不能不深感耻辱。……那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天皇制。我坚信：只有废除天皇制，中国人民才算是彻底追究了那场战争的真正的加害者，另一方面，日本国民也才能够从天皇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

有到那个时候，真正的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才能实现。”

### 2. 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

为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以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明治政府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包括女子教育，因此学龄女童的入学率不断提高。据统计，女童入学率1878年为23.5%，1888年为30.2%，1898年为53.7%，1908年为96.9%，1912年为97.6%。时至明治末期，女子中学和女子大学亦纷纷建立。1893年高等女校只有28所，学生数仅为3020人；1912年高等女校增至209所，学生数增加到64871人。随着大中小学校女生毕业人数的增多，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日本妇女的思想和行动。1890年10月30日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不仅把“天皇之德化，臣民之忠诚”确定为“国体之精华”和“教育之渊源”，而且将教育目标统合到“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一军事目的上来。为此，要求女子学校在内的所有学校，都要在校园内建立安放《教育敕语》誊写本和悬挂天皇照片的“奉安殿”，教师和学生每天到校、离校时都要向“奉安殿”行鞠躬礼；遇有庆典，要求学生朗读《教育敕语》，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升“日之丸”旗，唱“君之代”歌，等等。自此，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日本教育便沿着培养天皇“忠良臣民”的歧途前进。

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敕语》的基本精神被一以贯之继承下来，具体体现在前述文部省编发的《国体之本义》、《臣民之道》以及《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项》等“家族国家的经典”中。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女子教育，主要围绕“勤劳”和“母性”两个方面展开。前者针对的是在校女学生和未婚女子，主要通过“勤劳奉献”和参加“产业报国运动”来进行；后者针对的则是已婚妇女，主要围绕稳定家庭、生育和教育孩子来展开。1930年12月，文部大臣发布《关于家庭教育振兴令》、文部省次官发布《关于妇女团体之设置及活动通报》，号召“振兴家庭教育”，“促成妇女团体之奋斗”，“唤起一般妇女之自觉”。1941年4月，将“小学校”改称“国民学校”，下设“母亲班”，双管齐下对母亲和子

女进行军国主义教育。1943年9月,政府发布《促进女子勤劳动员令》,提倡以女学生和未婚女子为主结成“女子勤劳挺身队”,积极投身“勤劳奉献运动”和“产业报国运动”。1944年8月,先后发布《学徒勤劳令》、《女子挺身勤劳令》,动员女学生进入军工厂劳动奉献,学校逐渐工厂化。结果,所有日本家庭成了天皇“忠良臣民”的训练所,所有日本妇女成了“灭私奉公”、“尽忠报国”的模范。她们多数从自己的“小家庭”走向国家这个“大家庭”,对战争政府的指令无条件服从,对战争的“正义性”深信不疑,坚信自己的“支前”努力以及将男性亲人送上前线天经地义,对至亲之死无怨无悔。

### 3. 媒体的错误诱导和政府的高压统制

日本发动的“总力战”要求各行各业为侵略扩张服务,言论出版界也不例外。法西斯政府通过颁布《言论出版集会临时取缔法》、《出版法》、《报纸法》等一系列战时法律,将报纸、杂志、广播等媒体全部纳入战争轨道,封杀一切进步思想以集中灌输军国主义,诱导和驱使更多的日本国民为侵略战争卖命。这就使主要通过这些媒体获取信息的日本妇女,因每天接触美化侵略战争和掩盖战争暴行的虚假报道而失去了对战争是非的判断力,很难了解战争真相和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战争剧痛。例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京新闻》等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小学生为捐造飞机而节约每一枚铜板、女学生用血书勉励军人作战等所谓“感人美谈”;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大阪朝日新闻》等报纸盛赞所谓“肉弹三勇士”及其身后三位“军国之母”的“英雄事迹”;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茨城新闻》等报纸讴歌藤田多美子为激励飞行员出征而投井自杀的“尽忠之举”……随着战局扩大,报纸、杂志和广播对“军国之母”、“军国之妻”的介绍迅速增多,极尽煽动国民战争狂热之能是。其中,专门以妇女为对象的女性杂志发挥了特殊作用。战时影响较大的妇女杂志,主要有《主妇之友》、《妇人俱乐部》、《新女苑》、《妇人画报》、《妇人公论》、《女性往来》、《女学生》、《日本妇人》、《女性展望》等。《主妇之友》从九一八事变起刊登助战文章,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火药味渐浓,类似《南太平洋之战与妇女之觉悟》、《遭受了空袭怎么办》以及歌颂山本五十六大将的文章,大量出现在该杂志上。

在进行舆论诱导的同时,法西斯政府还对包括妇女在内的日本国民进行了高压统制。如前所述,“总力战”要求动员国家一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为战争服务。由《国家总动员法》、《治安维持法》、《治安警察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战时法律构筑的高压统制,“不仅殃及宣传领域,也殃及个人”;不仅对男性“思想犯”进行了毛骨悚然的折磨,也使少数反战“妇女遭受了残酷的凌辱”;不仅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被窒息,也使资产阶级妇女运动遭受沉重打击。这是造成多数日本妇女屈从战时体制,未能掀起亚洲人民所期待的妇女反战运动的重要原因。

[卢彦名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